

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文库

中俄人文合作 历史与现实

郭 力 等◎著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中俄人文合作 历史与现实

郭 力 等◎著

*Истори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人文合作历史与现实 / 郭力等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81129 - 655 - 6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文化交流 - 国际合作 -
研究 - 中国、俄罗斯 IV. ①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2043 号

中俄人文合作历史与现实

ZHONG-E RENWEN HEZUO LISHI YU XIANSHI

郭 力 等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张春珠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655 - 6

定 价 4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中俄关系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和多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一方面,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在国内事务上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任务与问题;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略伙伴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互信,又包括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和文化交往,而后者正是前者保持稳固的基础。然而,目前中俄人文合作交流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作为智力支持,既有的研究成果都以零散的状态存在,与中俄人文合作的实践缺乏有机的联系。目前,中俄人文合作的战略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尚属空白,中俄人文合作处于缺乏研究支撑的自发状态。这已成为中俄人文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基于此,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集中了所有的人力,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按计划完成了本书稿的撰写,了却了我院科研人

员力争为申报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多做贡献的朴实心态和良好愿望。

中俄人文合作是以人文领域的相关内容传播、交流与沟通为主导思想,以对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主要形式,通过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来影响两国的受众,进而促进中俄之间的进一步友好合作,构建中俄双方交流与合作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中俄人文合作既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又突出民众的广泛参与性和互动性,它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中俄人文合作的研究对于互为最大邻国的中俄之间的沟通、理解和相互认知意义重大。由于缺乏对异文化全面、客观的了解,人们往往会对异文化产生偏见,从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对抗和仇视。要克服成见,实现邻国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深入、全面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中国和俄罗斯有着4 300多公里的边境线,无论在高层还是民间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在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民众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之音,如不能及时化解,会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目前,中俄两国民众之间还存在缺乏相互认同、包容,相互欣赏与信任的问题。所以,扩大中俄人文合作,加深民众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中俄人文合作的研究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形成共识影响深远。中俄两国均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两国建立了战略安全磋商机制,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联合国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密切沟通协调。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精诚合作维护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国际形势健康发展的主要建设性力量。这种共识的形成,无疑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理念,而共同理念是源于思想文化上的相互认知和认同。

中俄人文合作的研究对于保障中俄区域安全实现全球和平与发展非常重要。中俄两国之间不存在重大矛盾。但是,一方面,中俄两国的合作与发展对区域安全和世界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中俄两国都对周边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中俄人文合作的宗旨就是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文化基础,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俄两国不断加深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增进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对于促进中俄区域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谐稳定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中俄两国文化和社会的认知、认同与互信,即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深厚基础上。而要使中俄人文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夯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就需要对人文合作的整体战略和文化基础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使其进入更高水平、更深的层次及更广泛的空间发展,减少人文合作的自发性,提高其科学性。

中俄人文合作的发展由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构成。其中,实践层面是指中俄两国之间各种类型的人文合作活动;理论层面是指对中俄人文合作规律性的研究。虽然中俄人文合作发展较快,涉及的领域日趋广泛,但是目前,中俄人文合作的发展主要还局限在实践层面上。2000年11月,中俄两国决定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中俄教文卫体委员会,为两国发展文化交流奠定了官方的条约法律基础,对统筹规范两国文化交流并使其机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人文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人文合作的内容,2007年7月13日,中俄双方签署了政府间议定书,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和电影7个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和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在2010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又增设了中俄青年合作分委会。

中俄人文合作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中俄人文合作将走向常规

化。目前,中俄人文合作还处于随机化阶段,各活动、各领域之间还没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随着各领域各种活动的增加,经常性的活动就会水到渠成。二是中俄人文合作将逐步机制化。目前,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框架内的活动基本上已经规范了,机制也比较健全。但是中俄人文合作不仅仅在合作框架内,对于超越框架的合作将来也必然会逐步向机制化发展。三是中俄人文合作将趋向于民间化。人文合作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需要全民参与。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很难全面规划。随着人文合作的不断深化,中俄两国民间的人文合作会更加广泛。四是中俄人文合作将出现多样化。以往的中俄人文合作基本上都是在某个框架下,或在某个组织下进行的。未来中俄人文合作会以全民为主体,以多样的方式来进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理论研究层面上,中俄人文合作交流规律的研究几乎处于拓荒阶段。一是目前尚未发现有关于中俄人文合作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中俄人文合作交流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作为智力支持。二是既有的中俄人文合作交流研究散见并依附于一些国内关于东北亚、俄罗斯及东欧的研究机构。三是已有的关于中俄人文文化交流的零散成果与中俄人文合作组织以及中俄人文合作交流实践缺乏有机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未能构建起来。四是既有的关于中俄人文合作交流的研究缺乏对中俄人文合作的整体战略研究。

中俄人文合作领域系统性研究的缺乏,使中俄人文合作交流基本处于没有理论支撑的自发状态,这已成为中俄人文合作交流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种研究的阙如指示出一种趋势——对中俄人文合作的研究已迫在眉睫。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繁荣做铺路石。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更是中俄人文合作实践的需求。

本书的成功撰写得益于李凤林先生、李静杰先生、李永全先生、吴大辉先生智慧的奉献和无私的支持,感谢他们对疑难问题的解答、对开拓研究视角的教诲,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予了我们做好研究的信心。本书作为我们的

初步研究成果向各位专家汇报,我们还将在该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争取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不辜负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专家及同人的深切期望。

本书共有九章。具体编写分工为:第一章中俄文学合作——马蔚云;第二章中俄绘画和音乐合作——陈思旭;第三章中俄教育合作——滕仁;第四章中俄青年合作——郭力、路高明;第五章中俄法律合作——常艳;第六章中俄传媒合作——于晓丽、葛新蓉;第七章中俄旅游合作——姜振军;第八章中俄卫生合作——周建英;第九章中俄体育合作——戚文海、李若华。

由于中俄人文合作研究对于俄罗斯研究院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加之本书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完成,所以本书无论是观点的提炼,还是研究的科学性都有待提高。同时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和综合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些偏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同人和读者不吝赐教,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任海天和编辑张春珠,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和勤奋工作,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

2013年8月27日

第一章 中俄文学合作	1
第一节 中俄文学合作的历史/1	
第二节 中俄文学合作的现实/9	
第三节 中俄文学合作中的问题/18	
第四节 中俄文学合作的趋势/27	
第五节 中俄文学合作的对策/34	
第二章 中俄绘画和音乐合作	39
第一节 中俄绘画合作/39	
第二节 中俄音乐合作/53	
第三章 中俄教育合作	68
第一节 苏联时期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70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91	
第三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97	
第四章 中俄青年合作	103
第一节 中俄青年合作的历史/104	
第二节 中俄青年合作的现实/106	
第三节 中俄青年合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110	
第四节 中俄青年合作的问题及对策/127	

130	第五章 中俄法律合作
	第一节 中俄法律合作的历史沿革/130
	第二节 中俄法律合作的现实分析/150
	第三节 中俄法律合作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问题/160
	第四节 中俄法律合作的对策分析/164
170	第六章 中俄传媒合作
	第一节 中俄传媒合作的历史与现实/170
	第二节 中俄传媒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75
	第三节 中俄电影合作/180
190	第七章 中俄旅游合作
	第一节 中俄旅游合作的有利条件/191
	第二节 中俄旅游合作的历史与现实/202
	第三节 中俄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206
	第四节 推动中俄旅游合作的对策建议/208
212	第八章 中俄卫生合作
	第一节 中俄卫生合作的历史/212
	第二节 中俄卫生合作的现实/215
	第三节 中俄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21
	第四节 中俄卫生合作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226

第九章 中俄体育合作	232
第一节 中俄体育合作的历史/232	
第二节 中俄体育合作的现实/238	
第三节 中俄体育合作存在的问题/245	
第四节 中俄体育合作的对策/254	
第五节 中俄体育合作的发展趋势/261	
参考文献	267

第一章 中俄文学合作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即一个民族长期创造形成的价值观、思维定式、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的内容,本章所指的文化为后者。一般认为,精神文化涉及文学(包括戏剧)、绘画、哲学、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中俄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内容很多,但双方合作最密切和双方最关切的方面是文学、美术、音乐等。本章主要梳理中俄文学合作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中俄文学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提出加强中俄文学合作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节 中俄文学合作的历史

中俄早在 19 世纪前后就有了最初的文学交流,其间有过中断,而后又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恢复交往并延续至今。但是,中俄大规模的文学交流却是始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从那时算起至 1991 年苏联解体,中俄文学交流的历史走过了 42 个春秋,呈现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1949 年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繁荣时期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俄苏文学作为外来文学思潮的一种传入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俄苏文学在外来文学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苏联政治上的“一边倒”导致了文化上的“一边倒”,国内提出了“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口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苏文学在中国得到空前的传播。仅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8 年 12 月,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就达 3 526 种,占这个



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种数的 65.8%；作品总印数达 82 005 000 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的 74.4%。^① 过去的译本大部分是通过英、法、德、日、世界语等文字转译而成的，而这一时期的译本都是根据俄文直接翻译，或者根据俄文重新校订的。俄国文学，尤其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契诃夫的短篇，以及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作品，对新中国文学的成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仅以托尔斯泰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共出版了 35 种托尔斯泰的作品，总印数在 170 万册以上。”^②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和《海燕之歌》，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 年以前苏俄作品的译本印数很少，只不过几千本，当时则以几万本计，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 1952 年一次就印过创纪录的 50 万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文学指导思想、创作方法以及理论批判原则，一度以苏联文学为楷模。“解冻”初期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 年）、爱伦堡的《解冻》（1954 年）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 年）等被及时地译成中文。以“解冻”文学思潮为开端的苏联文学主张现实主义及对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归，这一文学理论的变化迅速在中国文坛引起回响。中国文学界也开始批判“无冲突论”、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干预生活”。1954 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新章程，删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关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的提法，直接引发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创作方法问题的讨论。秦兆阳、钱谷融等作家对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质

① 卞之琳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 年第 5 期，第 47 页。

② 汪介之：《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3—194 页。



疑,王蒙、刘绍棠等作家对“干预生活,参与生活”口号的提出,就是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影响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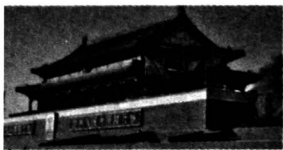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苏联大规模译介中国文学,鲁迅的作品最受苏联的欢迎。1954至1956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全集》,《呐喊》、《野草》、《彷徨》、《热风》、《坟》、《华盖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均部分或全部收录其中。此外,当时还出版了《鲁迅选集》以及《鲁迅短篇小说集》、《鲁迅短篇小说与论文集》、《故乡》、《阿Q正传》等单行本著作。

其他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出版的主要有《茅盾文集》(三卷集),郭沫若、茅盾、刘白羽、叶圣陶、萧三、赵树理等作家的选集,老舍的短篇小说、戏剧、论文集等。翻译出版的单行本著作主要有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铁水奔流》,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刘白羽的《火光在前》,马烽的《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和《生死缘》,茅盾的《子夜》,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陈登科的《淮河边上的儿女》,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春》、《秋》,草明的《原动力》,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

翻译出版的散文与戏剧作品主要有《到处是红旗》(樊哲祥等)、《最可爱的人》(中国作家短篇小说与特写选集)、《中国现代戏剧集》以及其他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叶圣陶、沙汀、杨朔、马烽等人的作品)。^①

从1952年起,中国戏剧开始在苏联莫斯科讽刺剧院、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苏联红军剧院、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上演。如莫斯科讽刺剧院演出了王实甫的《西厢记》(改名为《掷杯记》),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了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苏联红军剧院演出了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上演了郭沫若的《屈原》,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上演了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改名为《神奇的花朵》),莫斯科中央交通剧院

① 温福安:《中国文学作品在苏联》,《读书月报》1957年第11期,第7页。



(现名为莫斯科果戈理话剧院)和普希金话剧院演出了曹禺的《雷雨》等。苏联对曹禺的作品评价最高。苏联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评价说:曹禺“有力的独到的艺术手段表现出人民必定胜利、资本主义必定崩溃的思想。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着丰富的心理刻画和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剧本中特别引人入胜的地方。这里没有与剧情发展无关重要的穿插的人物,每个形象都具有社会人的悲剧性的正剧冲突,他们的个人深刻的命运里,都具有一般的、典型的意义”^①。

二、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的冷却时期

1956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加之中国自 1957 年起文艺界“左”倾倾向日益严重,中国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便急遽减少,以至 1957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的中译本,只得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问世,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苏联文学译作来说还是第一次。至 60 年代初期,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明显呈逐年递减趋势,“从 1960 年到 1963 年的四年间,公开发行出版的苏联文学译作(初版单行本)数分别为:3 种、3 种、4 种和 1 种”^②。这个时期,译介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体现在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一批苏联文学译作,如《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先后编译出版了《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 6 部文集,收录了自 1959 年以来苏联文学中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等各种观点的文章。二是体现在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批判苏联当代文学创作。例如,中国在 1961 年翻译出版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 年)是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思想和文学艺术界的现实而创作的政论性小说,是苏联自由派作家长期争论的继续。该部小说作者认为,“在‘解冻’以后的反对个人迷信、教

① 波里斯·沃尔金:《〈雷雨〉在莫斯科演出》,游默节译,《戏剧报》1958 年第 9 期,第 32 页。

② 宋炳辉:《50~70 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1994 年第 1 期,第 149 页。



条主义及官僚主义的高潮中,应该警惕那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乘机兴风作浪,破坏党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这些应该引起社会警惕的人自然就在其论战的对立阵营中”^①。中国翻译出版该小说的目的即是向读者表明,小说题材鲜明,主题思想突出,同1962年翻译出版的《州委书记》(原著1961年出版)一样,都是出于揭露苏联走上社会主义反面的意图。

中苏在1963年开始全面论战,两国文学关系进入了冷却时期,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从1965年开始,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俄苏文学作品。“文革”期间,俄苏文学作品的出版基本上陷于停顿,只出版了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海燕之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少数被奉为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从1977年开始,中国才恢复出版俄苏文学作品。不过,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也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一些苏联当代作品(主要是所谓的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爱伦堡的《解冻》、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内部期刊《摘译》也刊登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译介重点是苏联国内优秀的、有争议的作品,客观上为中苏文学交流提供了素材、对象,但对作品的选择和解读却是透过很深的“有色眼镜”,对苏联作品片面选择、任意歪曲的倾向很明显,译介的目的不是为了正面学习,而是将其作为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

1976年10月,“文革”终结,中苏文学关系开始缓慢解冻。由于中苏文学关系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冰封期”后刚刚开始复苏,苏联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理论界既表现出一定的活跃,同时也显得相当谨慎。因而,到1978年,中国国内出版社新版的和杂志刊登的俄苏文学作品虽然恢复到二十多种,但主要还是有一些定评的作家作品,如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及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的一些作品。

^① 宋炳辉:《50~7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第151页。



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中断了十几年的俄苏文学翻译出版工作才进一步从荒芜逐步走向正常,中苏文学关系出现了新的进展。

这个时期,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唐诗、宋词、宋诗、元曲、元明清诗、章回小说。其中包括吉托维奇翻译的《杜甫诗集》(1962年)、《杜甫抒情诗集》(1967年),艾德林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年),斯米尔诺夫编的《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歌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1979年),苏霍鲁科夫翻译的《王维诗集》(1979年),巴斯曼诺夫翻译的《辛弃疾诗词集》(1961年)、《漱玉词》(1970年)、《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年),戈鲁别夫翻译的《陆游诗歌》(1960年)、《苏东坡诗词集》(1975年),孟列夫翻译的《西厢记》(1960年),彼得罗夫翻译的《元曲》(1966年),谢曼诺夫翻译的《孽海花》(1960年),帕纳秀克翻译的《说岳全传》(1963年)、《三侠五义》(1974年),马努辛翻译的《金瓶梅》(1977年)。受两国关系的影响,译介较少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苏联译介之所以较少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苏联文学思潮出现变化。苏联文艺界1957年掀起“反修斗争”,至1959年中期结束,1960年掀起人道主义热潮。同时,苏联开始以开放的态度接纳西方文学,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苏联从6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题材和艺术手法新颖别致的“新浪潮文学”。二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文学交流。苏联将中国学研究所并入亚洲人民研究所,《苏联中国学》杂志也随之停刊。苏联关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不少带有明显的反华倾向,有的甚至全面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即使是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文学,也“极力称赞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重点关注工人阶级,很少研究1949年前的中国城市生活以及40年代政治史等问题”^①。

^① 熊文华:《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